

秦“安陆”故址新证

王先福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秦“安陆”首见于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该记录及同墓地出土的两封家信内容表明,秦“安陆”是秦人攻陷楚“安陆”后继设县,作为县或郡、州名一直延续至今。通过新出考古资料考证后可以认定,秦“安陆”故址为今云梦楚王城城址。城始建于战国中期,为楚因战略需要而设,废弃于东汉早期,是楚、秦至东汉早期“安陆”县治所,东汉早期后“安陆”迁离。

关键词:安陆;楚;秦;汉;云梦楚王城

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0)03-0043-05

安陆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县级行政区,迟于战国时期设县,并沿用至今。在传世文献中,安陆设县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为西汉新设江夏郡所辖,东汉因袭,但秦“安陆”不见于传世文献。1975年云梦睡虎地 M11 出土的《编年纪》为秦设安陆县找到了直接证据^{[1](P4)}。

《编年纪》有四处提到“安陆”：“(昭王)廿九年(前 278),攻安陆”,“(秦王政)四年(前 243),十一月,喜□安陆□史”,“(秦王政)六年(前 241),四月,为安陆令史”,“(秦王政)廿八年(前 219),今过安陆。”时代跨度从战国晚期到秦统一初年,前后达 60 年,其中昭王廿九年正是秦拔郢之年。其后,今江汉平原、随枣走廊和南阳盆地南部都纳入到了秦的统治范围。鉴于《编年纪》将“安陆”与“新城”“宛”“鄢”“邓”“邯郸”等当时其他“六国”的重要城邑并列,其地位显然十分重要。同时,结合秦拔安陆在同年秦拔郢之后的情况看,安陆被秦攻陷之前应该为楚邑,甚至楚县,而从“喜”先后担任“安陆□史”“安陆令史”的自述分析,秦攻陷楚安陆后,最晚于秦王政四年(前 243)设置了秦安陆县,秦王政二十八年(前 219),秦始皇南巡经过安陆。

新近出土文献《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之《水陆里程简》也印证了秦置安陆县的史实。《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抄写年代考证为秦王政三十一年(前 216)

和三十三年(前 214)^[2],其中《水陆里程简》多处记载有“安陆”与周边城邑、乡亭的陆路里程^{[3](P177~279)}，“安陆”出现的频次也较高,足见“安陆”在当时的地位。而楚“安陆”见于包山二号墓楚简：“十月辛巳之日,不将安陆下邑里人屈犬……。”(简 62);“辛未,安陆人陈环、陵人番乙。”(简 181)^{[4](P20~21,30)},从简文表述特别是前者表述来看,安陆确为楚县。经研究,包山二号墓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的公元前 316 年^{[4](P333)},而秦攻安陆为战国晚期偏早的公元前 278 年,如此短的时间,加上其时楚秦之间的战争密集且楚国处于败退局势,楚国基本无力他顾,因此安陆县治所的位置应该不会有变化,即秦安陆县继承楚安陆县而来,而楚安陆县的设置时间应该更早,具体时间目前难以考证。

关于秦安陆县故址所在,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

一是认为秦安陆县即今安陆县(市),其主要依据是《水经注》关于“安陆故城”的记载。据《水经注》卷三十一记载:“潏水又径随县南,随城山北,而东南注。又南过江夏安陆县西,随水出随郡永阳县东石龙山,西北流,南回,径永阳县西,历横尾山,即《禹贡》之陪尾山也。随水又西南,至安陆县故城西,入于潏。故郢城也,因冈为墉,峻不假筑。”清人杨守敬认为此“郢城”即“安陆故城”,属地为清安陆县城(今安陆县城前身)^{[5](P380~381)}。

收稿日期:2019-1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周代邓国考古学文化研究”(18BGK019)

作者简介:王先福(1968-),男,湖北云梦人,研究员,主要从事楚文化源流及相关问题研究。

二是认为古安陆县在随州淅河镇。主要是今人石泉先生据《水经注》的上述记载考证,认为秦汉晋宋齐梁时期,安陆县在今随州淅河镇,梁末将安陆县治迁至今安陆市附近。^[6]

三是认为秦安陆县在今云梦城关“楚王城”。主要通过云梦睡虎地秦墓、楚王城城址等十余个遗存的考古发掘资料分析后得出此结论。如黄盛璋先生“从而证明今天的云梦古城城址是楚安陆入秦后新建或扩建的新地城”,“所以此云梦古城应该就是秦安陆县城”。^[7]刘玉堂先生不同意黄盛璋先生“安陆”即“新地城”的观点,但明确“至于秦之安陆县城是否即今云梦古城,我认为可做肯定”^[8]。

秦安陆县究竟是上述三地之一,还是另有新地,前人已对传世文献资料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分析,我们主要通过出土文献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考古遗存的调查、发掘资料进行论证。

睡虎地 M11 秦简《编年纪》虽对“安陆”有记载,但根据该墓墓主“喜”的文字内容,无法直接确定其葬地与安陆的关系。从“喜”的履历看,他担任过“榆史”“安陆□史”“安陆令史”“鄢令史”“治狱鄢”,黄盛璋先生结合文献考证“令史”为秦时“令”的办事人员,地位在县丞之下;“治狱”即“治狱吏”,地位较“令史”高^[9]。作为一县之吏的官员,其生前居住于县城内或附近是合理的,而“喜”先后任职于“榆”“安陆”“鄢”等三地,那么他居住在后两地的可能性更大。《编年纪》记“喜”于秦王政七年(前 240)“治狱鄢”;秦王政十三年(前 234)至二十三年(前 224),“喜”从军,并先后参加了攻韩、赵、魏、楚(荆)的多次战争;秦王政二十七年(前 220),其子穿耳出生,由于此时秦已统一,他很可能回到了居住地;秦王政二十八年(前 219),“今过安陆”。刘玉堂先生分析,当时“喜”正在安陆,无疑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故才记下这件事。不难想象,墓主死后应葬于安陆境内。”^[8]既然《编年纪》所记“喜”的最后一个地名为“安陆”,“喜”生前应该就居住在安陆城内或附近,死后葬于睡虎地墓地。

而且,墓地同时期的秦墓 M4 出土的两件木牍文书也透露了安陆县与睡虎地墓地的有关信息。睡虎地 M4 的两件木牍是两封家书,是“黑夫、惊”写给其兄弟“中(衷)”的,信的主要诉求是请其母寄钱和夏衣给战争前线的他们,其中 11 号木牍记载:“今书节(即)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禅裙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来。其丝布贵。徒[以]钱来,黑夫自以布此。”^{[10](P25)}很显然,文中的“安陆”为有丝布坊市

的县城,其母、兄住地必定就在“安陆”城内或附近,按照生居死葬的一般规律,作为收信者的“中(衷)”死后下葬于睡虎地墓地,成为 M4 的墓主,则其生前居所的县治安陆城就在附近,睡虎地墓地也正是安陆城居民的墓地。

同时,睡虎地墓地多座墓葬出土了较多“安陆市亭”方形戳印的陶器,也为二者的关系提供了旁证。第一次发掘的“喜”墓(M11)出土的 2 件陶瓮(M11 : 8、M11 : 41)、1 件小陶罐(M11 : 32)、1 件小陶壶(M11 : 33)和 M14 : 2 之陶瓮肩部有“安陆市亭”戳印^{[10](P47~49)};第二次发掘的 1 件陶小口瓮(M33 : 37)肩上也印有“安陆市亭”方形戳印^[11];第三次发掘的墓葬出土陶器中,至少有 7 件小口瓮(M44 : 14、M45 : 8 及 M47 : 1 等 5 件)和 2 件小壶(M44 : 22、M49 : 21)、1 件甑(M44 : 19)、1 件盂(M45 : 49)、1 件釜(M44 : 25)肩、腹或底上有“安陆市亭”方形戳印^[12]。该墓地出土的“安陆市亭”戳印陶器共 10 余件,随葬的墓葬相对集中,其中 M11、M44 各 4 件,M45 有 2 件,M47 有 5 件,M14、M33、M49 各 1 件,时代为秦统一之前的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安陆市亭”戳印的风格十分接近,方形,左右各两字,字体相似,阴刻,以印模方式压盖到陶器上。目前发现的“安陆市亭”戳印陶文仅发现于本墓地及其东南不远处的龙岗墓地(详见后文)出土的陶器上,其他地方尚未发现。鉴于陶器的易碎特性,其在当地烧制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同处睡虎地墓地的 M77 出土了 2137 枚西汉文帝前元十年(前 170)至文帝后元七年(前 157)间的简牍,其内容显示墓主“越人”为西汉安陆县官员。简文内容丰富,包括质日、官府文书、私人簿籍与律典、书籍等,其中多处提到了“安陆”(县),如《质日》类“丙辰,销令穉守安陆”;“庚申,安陆汤沐邑除令到”;《官府文书》类“正月庚子,安陆丞毋择告武阳、阳武乡啬父”等^[13,14,15]。这些记载间接证明了西汉安陆县就在墓主下葬的睡虎地墓地附近的事实,与《汉书·地理志》所记安陆县相符,表明西汉安陆县正是沿袭秦安陆县而来。

确定了睡虎地墓地与“安陆”的关系后,我们借助考古调查的方法在其周边进行搜索,发现墓地的东侧就有一座大型古城遗址——楚王城城址,且为其周边唯一的遗址。

楚王城城址经过三次调查和三次小规模发掘,获得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城址位于今云梦县城关镇,平面近长方形,西部稍窄。东西最长 2 公里、

南北最宽 1.2 公里左右,四周城垣各保存一部分,城址中部有一条南北向城垣,将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城外有护城河,现存北城门;城址四角有高台建筑基址。城内断面可见文化层深度为 2~3.5 米,最深 4.5 米。西城内曾挖出排水管道和 6 口井集中的水井区。城址南垣外脚下发现西周遗存,城内暴露有丰富的东周秦汉时期的遗物。北垣叠压在包含东周遗物的地层上,东城北垣上发现了一座西汉初年的墓葬。由此初步判断,该城始建年代不晚于战国,东城可能在西汉初期一度废弃;东城内还发现东汉、唐、宋墓葬多座,推测东城在东汉时期成为墓区^[16]。考古发掘进一步丰富了城址的资料,第一次试掘城址中、南区,确认遗存时代为战国秦汉时期,西城北垣东端由主墙和内外护坡组成,城垣叠压在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文化层上,推测建城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城垣上发现了一座西汉早期土坑墓,或许其废弃时代在秦统一后。^{[17](P153~166)}第二次在西城内东、中区发掘,东区为战国、西汉时期遗存,中区为两汉至唐宋时期遗存,似乎均缺乏战国至西汉之间的遗存^[18],同时也表明东城很可能在两汉后废弃。第三次选点城址为中、南垣结合部,清理的遗存分三期,分别为春秋、战国中晚期、西汉初期。从发掘资料看,南垣与整个大城建筑年代相同,南垣底部叠压在战国中期地层上,且南垣出土遗物均为战国中晚期,这表明大城的始建年代不早于战国中期,不晚于战国晚期;而中垣叠压在南垣上,其上文化层时代为西汉初期,但城垣夯土内未见晚于西汉初年的遗物,推测中垣建于西汉初期。再根据中垣曾发掘出东汉早期砖室墓来推测,该城的废弃可能在东汉早期或略早^[19]。

无论是调查还是发掘,均表明楚王城城址始建于战国中晚期。结合西汉初期墓葬分析,该城北垣很可能在秦末或西汉初年有短暂被废的情况,或与当时的时局动荡相关。鉴于调查或发掘时城垣的高度已被破坏,最高仅残存 4 米,与实际筑城的高度差距较大,我们推测在西汉初年后,城垣有个增筑的过程,并加筑了中垣。东汉早期及以后墓葬在东城的发现,证实至少东城应废弃于东汉早期。同时,东城内分别发现的东汉前期^[20]和东汉末期墓葬^{[21](P338)}也印证了其废弃的年代不晚于东汉早期。而西城内的文化遗存在两汉至唐宋间出现缺环,表明西城在东汉时期被废弃。据此推断,楚王城城址的始建、使用年代应该为战国中期至东汉早期,城外较为密集的同时期墓地也为楚王城城址的时代和性

质提供了依据。

前述睡虎地墓地是城外规模较大的墓地,除了三次发掘的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墓葬外,第四次发掘了 29 座同等规模、形制和出土随葬器物基本相同的同时代墓葬;2006 年第五次发掘了 M77,出土漆、木、竹、陶、铜、铅、石器随葬器物 37 件,以及 2137 枚简牍。根据随葬器物形制和简牍纪年分析,墓葬的时代为西汉文帝末年至景帝时期^[13]。该墓地出土了大量漆器,秦墓的相当部分漆器上针刻、烙印文字与符号,文字中“亭”“里”“市”等字的出现频率很高,有的地方还加上了地名,如“咸亭”“郑亭”“路里”“钱里”“咸市”“许市”等^[10,11,12]。很显然,这种加了地名的“亭”“里”“市”应是器物制作地和输出地或制作者的居住地,但均不见同墓地陶器上的“安陆”地名。结合“咸”指代当时的咸阳看,这些漆器应均为外来品,便于携带和长途运输,说明当时的商品生产已集约化。陶器易碎,基本上只能在本地生产。此外,在睡虎地墓地北侧约 200 米处的木匠坟曾发掘了 20 座战国秦汉墓葬,其中部分漆器上也有“亭”“市”等字。^[22]

从墓葬分布和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状况看,睡虎地与木匠坟很可能为同一个墓地,其所处的岗地正是楚王城城址外一处战国末年至西汉早期的大型低级官吏、中小地主和平民墓地,应该还有大量墓葬埋藏在汉丹铁路及路旁的铁路货场、火车站下,只是在早年修路时已被破坏。

在楚王城城址外围周边特别是南部,我们陆续发现和发掘了多个同时期的墓地。城址外西南角的大坟头墓地发掘了 3 座西汉早期墓葬,其中西汉初年的大坟头一号墓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不少漆器有与睡虎地墓地类似的“亭”字等烙印、针刻文字。据墓内一方玉印文判断,墓主为“速”,联想到睡虎地墓地 M11《编年记》有“五十六年,速产”的记载^{[1](P4)},或许二者为同一人,若此,两墓地及楚王城城址之间更有紧密的联系^[12,23,24]。

城址中段南城垣外 450 米处的龙岗墓地,分两次发掘战国晚期秦至西汉早期的墓葬 15 座,其中多件漆器有烙印、针刻文字,5 件瓮、2 件罐、2 件釜、1 件孟等 10 件陶器肩或底部有“安陆市亭”方形戳印,并出土了一批简牍^[25,26,27]。

城址东部南约 250 米的珍珠坡曾发掘了 10 座战国早、中、晚期和秦末至西汉初年的小型土坑墓^[28,29];城址东部南约 300 米的老虎墩墓地清理出战国秦汉墓葬 20 余座;城址东部南约 400 米的郑家

湖墓地(龙岗墓地东北约300米)曾先后两次清理70余座战国墓葬^{[30][P336]};位于龙岗、郑家湖墓地之间的江郭墓地处2018年勘探发现墓葬100余座,已清理55座,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

可以说,上述墓地除极少量战国早期墓葬外,时代均从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正好与“楚王城”的始建和繁盛时代相一致。

《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记录了一条江陵—竟陵—安陆—沙羡的东西向干道:

江陵东到井韩百六里。(04—064)

井韩乡到竟陵九十八里。(04—065)

竟陵到郢乡百廿里。(04—77)

郢乡到安陆百卅里。(04—078)^{[3](P230)}

同简另有一条记载“竟陵到安陆二百五十里。(04—215)”^{[3](P232)},正合上述竟陵—郢乡—安陆里程之和,两条记录可相互印证。

按照简单的数学加法,从江陵东出前往安陆的距离为454里,以秦里约合今里415.8米^{[31](P10~11)}计算,该距离约为188.77公里。

江陵即秦南郡郡治,专家们一致认为其在今荆州市荆州区郢城遗址,文献、考古证据十分充分,笔者在此不再赘述。按照现行数据分析,从郢城往东(或东北)至今云梦楚王城城址的直线距离约163.5公里,到今安陆市区的直线距离约173公里,而到今随州浙河镇的直线距离为188公里。很显然,江陵到安陆之间的道路里程不可能为直线,如果考虑到当时这里为古云梦泽地域,道路蜿蜒曲折程度更高,则曲线188.77公里为郢城至楚王城城址的距离似乎更为合理。

楚王城城址第三次发掘的南垣下叠压的战国中期遗存是与建城时代基本同时的遗存,那么,在该城建成前城内外有没有更早的文化遗存?这或许能为楚王城选址建造的背景提供一点线索。

《明一统志》卷六十一《德安府》载:“楚王城在云梦县治东。按《左传·定公四年》,吴入郢,楚昭王奔郢,盖筑此城以自保也。”道光《云梦县志略》卷一《史迹》载:“楚王城,吴入郢,昭王奔云梦所筑。”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也记载:“云梦县有楚王城在县东,左传说定公四年吴入郢,楚昭王奔郢城,因以名。”故传统观点认为,楚王城为楚昭王所筑,其前身或为郢国故城。

从楚王城城址的调查、发掘和清理来看,春秋以前的遗存有三次。被认为时代最早的遗存是1992年在城址内清理的H11,其填土分为两层,出土较

多的陶器残片,复原鬲、甗、盆等陶器7件。整理者根据陶器的对比推测,该灰坑下层的时代不晚于西周晚期,上层为春秋中晚期。^[32]现在看来,这一时代划分需要重新认识。简报将H11下层复原的鬲、甗与枣阳毛狗洞^[33]、沔西张家坡^[34]、均县朱家台^[35]等西周遗存出土的同类器进行对比,其主要特征存在较大差别,特别是鬲口沿。从类比的相似度来看,H11之A型鬲、甗分别与枣阳周台遗址战国早期A型V式鬲、战国中期V式^{[36](P34~101)}十分接近,A型鬲整体形制、纹饰还与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仿陶铜鬲(C·126)^{[37](P203)}和庙台子遗址战国时期AⅠ、AⅡ式鬲^{[38](P177)}类似,就是与战国中期的擂鼓墩二号墓之A型仿陶铜鬲(M2:78)^{[39](P51)}相比,也有较大的相似性,只是后者肩部圆凸,时代稍晚。而H11之B型鬲与宜城郭家岗遗址战国中期晚段AⅨ式鬲^[40]相比,整体风格相同,只是本鬲的裆线稍高,时代应较早;由此推断,H11的时代不早于战国早期。同时代或稍晚的遗存是1987年第三次调查在城址南垣外发现的西周遗存^[16],因为陶片较少且残,划分时代的难度较大;从鬲口沿卷沿的情况看,将其时代定在西周显然偏早,应与上述H11鬲口沿相近,很可能为战国早期。1992年第三次发掘的中、南城垣结合部的第8层,即第一期遗存被发掘者推定为春秋时期,甚至推定有春秋早期的遗物^[19],该层出土的陶器也少而碎,主要为卷沿鬲口沿、深腔鬲足、广肩瓮口沿,以及筒瓦、板瓦残片等。卷沿鬲是战国早期的典型器物,出土的筒瓦、板瓦的时代也相对较晚,不早于战国。也就是说,楚王城城址最早的遗存不会早于战国早期,这与1987年第一次试掘叠压在西城北垣下的文化层时代正好吻合。前述城外珍珠坡墓地时代最早的墓葬也为战国早期,这应该不是巧合。

可以说,不论城址的始建年代,还是城内文化遗存最早时代的界定,都否定了该城曾为春秋时期“郢国城”、楚昭王筑“楚王城”的传统观点。

从城址内发掘的H11等遗存出土陶器的主要特征来看,卷沿微瘪裆深腔足鬲(甗)、折肩(腹)盆、双弓耳罐等显然是曾文化的风格,这从对比的枣阳周台遗址、随州庙台子遗址、曾侯乙墓和广水巷子口遗址^[41]等遗存出土同类器的风格可以看出。而弧裆鬲(如H11之B型鬲、86YCYGc⑥:1)则是典型的楚式鬲。或许“楚王城”在建城前,这里是曾国的聚落,但也受到了楚文化的强烈影响。楚国出于东进的需要,占领该区域后,在这个地理位置重要的随

枣走廊南口选择建城,并设“安陆”县。由于此时北部受到来自秦、韩的压力,楚国或许要据此建立郢都(江陵纪南城)与楚王城北约 130 公里的楚国重要城邑之城阳城^{[42](P45~46)}的联系,从而保证楚国东出北进的重要交通线,秦白起拔郢、楚顷襄王“东北保于陈城”或许正是走的这条线路。城外珍珠坡、郑家湖、老虎墩等墓地就有较多的战国楚墓与之对应。

正是由于楚王城城址城垣的时代沿用到西汉乃至东汉早期,上述城址外多个墓地的时代也基本相同,这一考古证据表明,至少在东汉早期以前“安陆”县治未移动位置。但城址废弃及城外上述墓地很少见到东汉以后的墓葬,特别是不见集中聚葬的东汉以后墓地,这表明,“安陆”县治在东汉早期以后很可能迁离本地了,其后的安陆县治或已一次甚至多次变动。当然,从城址西部仍然发现有两汉、唐宋文化遗存和城外蔡陈村、袁林两处东汉六朝隋唐墓地^{[30](P338)}的情况看,西城內应一直有人居住。而据《隋书》卷三·志二六《地理下》记载,这里在西魏置“云梦”县,属安陆郡,并延续至今,其县治应该就在西城。

参考文献:

[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2]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J].文物,2012(6).

[3]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A].李学勤.出土文献(第四辑)[M].上海:中西书局,2013.

[4]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5]杨守敬.水经图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石泉,鲁西奇.公安陆城故址考[J].江汉考古,1995(3).

[7]黄盛璋.云梦秦墓两封家信中有关历史地理的问题[J].文物,1980(2).

[8]刘玉堂.秦汉之安陆并非新地城——与黄盛璋同志商榷[J].文物,1982(3).

[9]黄盛璋.云梦秦简《编年记》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7(1).

[10]《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11]云梦县文物工作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1(1).

[12]湖北省博物馆.1978 年云梦秦汉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6(4).

[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云梦睡虎地 M77 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08(4).

[14]熊北生,等.湖北云梦睡虎地 77 号墓西汉墓出土简牍概述[J].文物,2018(3).

[15]蔡丹,等.睡虎地汉简中的质日简册[J].文物,2018(3).

[16]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孝感地区两处古城遗址调查简报[J].考古,1991(1).

[17]熊卜发,等.云梦楚王城城址发掘和城墙解剖[A].鄂东北地区文物考古[C].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1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云梦楚王城城址 1988 与 1989 年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2(1).

[1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92 云梦楚王城发掘简报[J].文物,1994(4).

[20]孝感市博物馆,等.云梦县楚王城汉墓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1997(3).

[21]云梦县博物馆.云梦罩子墩一号墓清理简报[J].江汉考古,1990(2).

[22]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木匠坟秦墓[J].文物,1992(1).

[23]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云梦西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3(9).

[24]湖北省博物馆.云梦大坟头一号墓[J].文物资料丛刊,1981(4).

[25]梁柱.云梦龙岗发现秦代墓葬和秦法律文书[J].江汉考古,1990(1).

[2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1990(3).

[2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1993(1).

[28]云梦县文化馆.云梦县珍珠坡一号楚墓[J].考古学集刊,1981(1).

[2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云梦珍珠坡 M17、M18 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1992(2).

[30]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

[31]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32]云梦县博物馆.云梦楚王城 H11 清理简报[J].江汉考古,1996(4).

[33]襄樊市博物馆.湖北枣阳毛狗洞遗址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1988(3).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84—1985 年沔西西周遗址、墓葬发掘报告[J].考古,1987(1).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长江工作队.湖北均县朱家台遗址[J].考古学报,1989(1).

[36]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枣阳周台遗址发掘报告[A].王道义.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37]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38]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西花园与庙台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39]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擂鼓墩二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40]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湖北宜城郭家岗遗址发掘[J].考古学报,1997(4).

[4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广水巷子口遗址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08(1).

[42]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